

2017年8月

二、《全球化向何处去》

序

“全球化”是一个格局宏大、源流深远、波澜壮阔的长期进程。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在其经典之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21 Century) 中就将全球化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由 1492 年至 1800 年是“全球化 1.0”，力量来自国家；由 1800 年至 2000 年是“全球化 2.0”，力量来自跨国企业；而从 2000 年起，进入“全球化 3.0”，力量来自个人。

2017 年，弗里德曼在全球化智库 (CCG) 的演讲中进一步与大家分享了他眼中的全球化最新进展。他指出，当今世界有三大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世界：一是市场，二是自然界，三是摩尔定律。在他看来，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推动了数字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又驱动着气候变化，进而产生了更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正是这三大力量之间的互动塑造着这个世界。

作为国内第一家以“全球化”为名的智库，CCG 一直是“全球化”的理念先行者和实践推动者。在“全球化”概念远未如今天这般被国人广泛接受的时期，我们便长期研究移民、留学等全球人才议题，探寻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积极推动全球化理念在中国的传播。

尤其进入“全球化 3.0”时代以来，我们始终关注的“人的全球化”呈现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趋势。我们认为，中国在这第三轮全球化浪潮中占据相当分量的优势地位，应该把握全球人才动态流动与联结的时代红利，探索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理想通路。

近年来，针对全球化的大变局，CCG 及时予以回应，并基于对全球化的长期跟踪研究，与世界分享我们对全球化的新想法、新思路。2017 年，我们力邀数十位顶尖学者解读“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乃至全球政府及企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出版了《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一书，获得积极反响。

然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较量仍在继续，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仍需集思广

益。正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提出的新颖命题，他用“伊斯特利悲剧”来命名当今全球治理模式的顽疾，作为比“金德尔伯格陷阱”更具有针对性的全球治理议题。并指出，从全球视野观察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揭示中国方案的全球意义，可以作为对“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伊斯特利悲剧”的正面回答。

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出版这本《全球化往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顾名思义，正是为了总结目前全球化议题的最新进展，进一步摸清全球化的理路，并提出能够在新时期与时俱进的“中国策”，为优化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活力。

诚如我们所见，“全球化”这股萌芽于大航海时代的洪荒之力，自诞生以来一步步打破地理藩篱、重塑全球格局、通过打通全球市场，连接各国生产、贸易体系，促成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自1970年到2015年，全球GDP总量从约2.95万亿美元成长到约74万亿美元，翻了20余倍。而贸易方面，世界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3000多亿美元，成长到2016年的约15.6万亿美元，涨幅高达50余倍。

另外，相伴而生的科技进步和国与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史无前例地拉近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因而，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几乎是参与本书的学者们的共识。在书中上篇，赵汀阳尝试把全球化的现状置于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下探讨，他认为全球化运动正在生成一个世界旋涡模式，有一种无可阻挡的普遍化力量，故即使目前受到一些挫折，但“历史难逆”。而在方晋看来，在前一阶段全球化大发展之后出现一定调整是正常的，如果用一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调整的话，那就是“替代型”全球化将回归“互补型”全球化。

然而，即使全球化势不可挡，但历史潮流中的小漩涡同样不容忽视，近几年来，那些全球化的“光辉岁月”里未被重视的伤疤，正在成为这条道路上的不和谐因素。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的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到昔日自由贸易思想的滥觞英国不惜与欧盟“划海峡而治”。各国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最早提出TPP的美国扬长而去，WTO及其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而欧洲一体化的信徒们仍在忧心从柏林、巴黎到罗马的右翼力量崛起和欧盟的进

退两难。

正如时殷弘教授在本书所言：“以一种大为急剧的方式，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全球治理和全球开明秩序（global liberal order）面对严重挑战。”对此，本书的中篇正是中国学者们对全球化危机的集体反思。

谈到全球化走入大变局的原因，多位学者提及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各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加剧。高飞在分析全球化困境时就首先指出，世界基尼系数已超公认的 0.6 “危险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显现推动了民粹主义情绪蔓延。”在时殷弘看来，西方跨国精英在这一点上难逃其咎，正是他们对自由主义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放肆滥用，以其自私、傲慢、偏狭、盲目和殆无节制的挥霍疏离了他们国内的“草根民众”，尤其是“白人草根”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才种下反全球化的祸因。他写到：“2008 年秋季爆发非常广泛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已经以经济金融方式对他们发出再清楚不过的警告。”李奇泽、黄平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不能从自身社会结构出发思考造成贫富分化的制度性根源，而把造成问题的原因引向经济全球化，则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今天，全球经济仍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朱民基于对全球金融市场结构性变化的系统性剖析，进一步提出了他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忧虑。他指出，由于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采取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种背离的央行货币政策导致货币市场波动。同时，全球金融机构发生巨大的变化，金融的中介功能从银行业走向非银行业。在这个背景下，全球金融整体水平高企，而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关联和互动性大大增强和提高，因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上升。但全球处理和抵御风险的政策空间和市场能力却在急剧地收缩，这是今天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

黄仁伟则以辩证的精神解释全球化变局，在从四方面归纳当前“逆全球化”的几大表现之后，他总结到：“正面全球化和负面全球化是同时存在的，是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两股力量。这两种力量并存的情况下，全球化就不可能是一种不加选择的全面全球化，只能是有所选择的全球化。”

那么，何谓“有所选择的全球化”？因为各个国家发展不平衡，必然会让那些处于全球化得利状态的国家积极赞同并大力推进，反过来又会促使那些全球化得利不足甚至丧失利益的国家，阻止全球化的步伐，催生逆全球化的倒退。显然，

这种剧本正在如今的世界上演。

看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对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全球化何去何从，考验国际社会的集体智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长施瓦布指出：“我们必须让全球化变得更加公平，但是，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不应该只从西方角度来看它，而是应该从全球角度来看它。”

事实上，放眼全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恰恰是在参与、互动中深刻影响世界的崭新力量。40年来，中国从最初对全球化的有限认识和保守应对，到逐步接受、全面推动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性剧变既使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让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现今，借庞中英在本书所言：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危机和世界秩序危机时刻提出真正可被接受的有效的“中国方案”，并带头“最佳实践”之。

伴随着中国与全球化的密切互动，也为了实现更理想的全球化，CCG一直致力于凝聚“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建言献策。在本书下篇，我们就集结了多位学者对于“中国方案”的战略机遇、实现手段等诸方面的洞见。

徐洪才首先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发生的十大变化做了前瞻，他认为，未来10年甚至到2030年之前，对中国而言仍将是一个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通过扩大开放，促进体制改革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走封闭的老路，很多改革可能落不了地，中国也可能与战略机遇期擦肩而过。

张蕴岭和屠新泉从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切入，以把握全球化的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张蕴岭的文章展望了中美关系的宏观未来，他认为中美关系不会破裂，两国也不会发生大对抗，因为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因此，对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不要太悲观，中国的定力主要在自身。屠新泉则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出发探讨WTO的前景，在他看来，美国可能不会退出WTO，但是反建制力量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一定程度上对WTO机制的运行和争端解决机制裁决的执行造成负面影响。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新贸易政策施政重点”，中国应该积极面对，运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的利益。

王义桅和黄剑辉则对具体的“中国方案”加以论述。王义桅在文章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来可能或正在开创“中式全球化”。这表明中国从参与到引领全球化角色转变，通过倡导文明的共同复兴、开创文明秩序、实现陆海联通和

全球化的本土化，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共商、共建、共享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扬弃了西式全球化，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给全球化注入中国色彩。黄剑辉借镜中新“苏州工业园”模式，提出组建中国与亚非拉互利合作的实体经济端区域性或国家级合作平台、促进亚非拉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等战略设想。他认为中国应该积极扩大对亚非拉国家的开放，加快构建与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共同促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新型投融资模式，以促进与各国的平等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对提升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均具有重大意义。

周晓晶与丁一凡分别从宏观层面讨论新时期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并同时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或说新兴国家的作用。周晓晶表示：“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必将取代美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并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与方向。”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领头羊的中国，正在提出“一带一路”、“金砖+”等新理念，为新兴国家推动、参与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模式的优化与改善提供重要机遇。在周晓晶看来，只有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成为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共同责任，加大力度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才能够真正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十年萧条。

对此，丁一凡所见略同，他认为中国要借助当前的历史机遇，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密切合作，拯救全球经济合作框架及多边自由贸易机构和机制。与此同时，在控制好中国国内金融泡沫的基础上，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时机，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利用投资与贸易扩大自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重塑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国际体系。

的确，面对全球化遭遇的时代难题，作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的中国正在担负更多责任，提出更多主张，迅速成长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中国方案”这些年来不断吸引国际目光。“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开放包容的精神，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为公平的选项，也为世界经济的复兴开发新动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更是中国传统智慧中“以人为本”思想对“全球化 3.0”——“人的全球化”时代之义的生动诠释。苏浩在其文中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植根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思想精髓，这也算得上是农耕文明时期中国观念式的全球化的一种螺旋式回归。而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女士的话说，中国正在“以自己的能力和方

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达沃斯论坛上说到：“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主席再次强调：“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 2000 年 4 月发表的《千年报告》中早已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

正如其在历史长河中遭遇几次进退循环，又最终走到今天一样，“全球化”当下面临的种种逆流始终难以改变其无可逆转的大势所趋。这些汹涌的逆流恰为我们敲响警钟，催促我们提出更公平、正义的全球化。

在此关键时刻，CCG 于 2017 年 4 月在北京主办了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我们把这届论坛的主题定为“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正是为了让政、商、学界精英代表汇集一堂，深入探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研判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挑战，共同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参与该论坛的各界人士包括陈启宗、陈永龙、崔洪建、丁一凡、傅成玉、何宁、黄剑辉、黄仁伟、霍建国、贾文山、焦涌、金灿荣、金鑫、李学海、刘燕华、龙永图、吕祥、茅忠群、庞中英、时殷弘、宋志平、苏浩、孙杰、孙永福、汤敏、屠新泉、王辉耀、王琳达、汪潮涌、王石、王阳、王义桅、王直、魏建国、徐洪才、薛澜、薛永武、易珉、查道炯、张醒生、张燕生、郑永年、周晓晶、朱锋等。他们在论坛上的真知灼见，也将收录于本书的附录，与正文互为呼应。

本书荟萃中国“智库之智”，涵盖对全球化的系统阐释、反思与期待，并囊括了国内全球化领域学者们眼中的“中国方案”。期待它成为我们在为世界、为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漫长道路上踏出的坚实一步，也助力我国的全球化战略在“人的全球化”时代历久弥新。

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 王辉耀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博士

2018 年 3 月